

博物館如何讓社區動起來？臺灣地方 文化館政策中的社區實踐 ——以金水地區為例

施岑宜¹

摘要

1980年代的新博物館學運動啟發並重新檢視了博物館的功能角色，尤其是與地方發展息息相關的中小型博物館，這些座落於各「地方」的博物館擺脫過往以「物」為核心角色的習慣，開始思考「人」的問題，博物館變成社會運動的一種工具，其型態也呈現多樣化，定義博物館的邊界開始越來越模糊。

這樣的趨勢發展也影響到臺灣，期望以散落在各鄉鎮之地方文化館為首要，進行新的產業革命與城鄉再發展。研究地方文化館政策須從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談起，該政策是臺灣近年來最具影響力且持續的文化作為，回溯政策初始的臺灣社會面臨著巨大的轉變與挑戰，從對國家政治認同的疑惑、社會結構的變化到都市與城鄉發展惡化等，既有威權的漸漸解體與對過往歷史記憶的壓抑反動，讓執政者被迫提出一個因應政策來接合這樣的缺口，而博物館就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工具，在此時被賦予帶動地方發展與建構地方認同的重要任務。

本研究觀察在臺灣地方文化館風潮中，不約而同多以「生態博物館」這個理念為主要實踐目標，這個主要從法國發展實踐的新博物館論述，講求博物館作為建構地方認同的工具，將詮釋生活方式與歷史的權力賦予當地居民，召喚居民的地方認同感，也使他者獲得認識地方社會的機會。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為臺灣第一座以生態博物館論述籌備規劃並對外營運的公立地方文化館，本研究以其為案例研究對象，並探討博物館長期的社區策略中為何無法有效讓社區動起來，試圖從中探討生態博物館這個看似應許般符合各界對地方文化館多重社會想像的理想論述，在實踐過程中為何無法實現其承諾，是論述過於理想性？操作方式錯誤？還是規劃者與執行者一廂情願的誤解與謬用？本研究同時比照另一個在社區藝術創作者自主動力下組成的山城美館，探討其藉由藝術與文化生活逐漸誘發居民參與的過程，期望從這兩個在相同地域的微觀案例研究中，剖析探討能放置於臺灣社會脈絡中的共通性。

關鍵詞：地方文化館政策、黃金博物館、山城美館

¹ E-mail: whosehouse@gmail.com

前言

法國理論家 Debord 在 1957 年提出情境建構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 的概念 (Debord, 1957: 110-114)，雖然主要是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所建構的人為景觀社會，但其試圖提醒人們改變對世界的覺知方式並取回對意義詮釋權的意念，這樣的論述在情境上剛好接合上二戰後西方諸多社會問題湧現後的反思，帶動之後西方各種社會運動風潮。我們可以說 1970 年代法國的生態博物館運動及 1980 年代的新博物館學運動，都受其啟發而開始重新檢視博物館的功能角色，尤其是與地方發展息息相關的中小型博物館，博物館變成社會運動的工具。這樣的趨勢發展也影響到臺灣，期望以散落在各鄉鎮之地方文化館為首要，除了進行產業革命與城鄉再發展外，同時也期待能成為建構公民社會的賦權過程。

研究臺灣地方文化館政策須從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談起，是臺灣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文化政策。回溯當時的臺灣社會正面臨著巨大的轉變與挑戰，既有威權的漸漸解體與對過往歷史記憶的壓抑反動，讓執政者被迫提出一個因應政策來接合這樣的缺口，而博物館就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工具，在此時被賦予帶動地方發展與地方認同建構的重要任務，只是不同於以往，居民不再是博物館裡頭被動的觀者，而是情境建構的共同夥伴。

地方文化館政策回應了臺灣在 80 年代的社會挑戰，也呈現出此時期臺灣文化政策從中央走向地方的轉型，而弔詭的是這些被賦予重任的地方文化館在臺灣博物館業界或學界中，卻常常被忽略或角色混淆，放置在既定的博物館框架中被討論與審視，以致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易被誤導拘泥於博物館專業而遺忘其肩負社會運動工具之重要使命。研究

者因個人生命歷程中身為實際地方文化館政策的參與行動者，從懵懂無知、角色困惑到豁然開朗，漸漸釐清作為一個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的任務與角色，所以這篇研究論文取徑文化研究的方法，從個人經驗出發並扣連相關政策的時代脈絡來書寫，期望針對特定案例的研究，試圖提出有關臺灣地方文化館與社區營造政策論述或理論之可能性。

研究背景

研究觀察發現在臺灣地方文化館風潮中，不約而同多以「生態博物館」這個理念為主要實踐目標，這個主要從法國發展實踐的新博物館論述，講求博物館作為建構地方認同的工具，將詮釋生活方式與歷史的權力賦予當地居民，在創造共同經驗的過程中，建構居民的地方認同感，也使他者獲得認識地方社會的機會。公民社會在歐美或日本都有長久的歷史，但在臺灣卻是一個新生的現象，其原因和臺灣過往歷經殖民及威權統治造成其特殊之現代社會建立過程有關。所以當西方生態博物館的論述移植 (transplant) 到臺灣社會脈絡中的實踐過程，如何真正落實賦權 (empowerment)？而居民是否已具備資能 (competence) 來承接公民社會的來臨？論述實踐過程造成何種效應與質變？而博物館真的能讓社區動起來嗎？是否能發展出一種臺灣在地發展的論述與可能性？以上之提問，在在引發研究者的興趣。

從研究者的生命經驗書寫起

上述的研究提問，一直是研究者長期關注的議題，在研究之前，請容許研究者書寫為何引發上述問題意識的過程。研究者於 1995 年在宜蘭²參與社造

² 研究者當時服務於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工作室。

工作，當時正值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發端期³，新政策帶動的草根運動，除了環境美化之外，根本在於能否留住年輕人及在地就業的機會，具體想像就是社區傳統產業的振興與文化觀光。於此同時，蘭陽博物館計畫也開始規劃進行，研究者參與其中之類博物館發展計畫，目的在串起社造運作中的宜蘭社區，以整個蘭陽就是一個博物館的概念來含括，並以核心館串連宜蘭各處的衛星館，當時用的就是生態博物館的論述。

之後不論是在研究所⁴時期或是實際工作，在當時，以博物館帶動地方文化觀光逐漸發展成一種政治趨勢，也引發研究者對地方文化館工作的興趣。

2002年研究者進入籌備中的十三行博物館，一個位在八里鄉以十三行文化為主軸的考古博物館，因早期國家重大建設引發的遺址搶救保存運動而產生。當在思考一個冷門的考古博物館位處在臺北都會邊緣如何能成功營運與永續發展時，博物館提出「水岸、社區、博物館」概念的區域發展圖像，並以八里左岸計畫落實執行，剛好扣合上地方政府希望透過大型計畫來解決人口流失、經濟衰退、邊陲化等問題（林明美，2006: 65-74）。一個以地方文化館為核心的地方發展藍圖，作為對八里鄉民的發展許諾，以召喚縣民的政治認同，也是以所謂生態博物館的理想為博物館自身定位，開館後成功帶來了八里的再發展。如果重新檢視該館是否是一個生態博物館的具體實踐時，現實所見是一個展現由上而下、創新的地方遊憩空間塑造，與地方產業和生活脈絡脫節，並非從社區培力、凝聚共識著手。

2004年研究者因定居瑞芳而轉進甫成立的黃金博物館，該館成立宗旨第一

句話即宣稱乃國內第一個以生態博物館理念對外開放的博物館。黃金博物館的營運過程中，社區參與一直是個難題，即使提供現場工作人員百分百的在地任用、地方居民免費參觀、敬老、參與地方廟會活動、地方文史調查、開放地方藝術家展覽、社區課程到社區親子圖書館計畫等，社區關係依舊難解，社區並未因此動起來，居民的抱怨依舊與無法認同博物館，引發了研究者探究的動機。回溯該館的籌備過程，因恐被九份發展光環掩蓋，在金瓜石去名化的危機下，居民主動參與推動博物館的籌備，但為何在籌備的過程中，居民退居被動的角色甚至消失？黃金博物館憑藉什麼宣稱自己是一個生態博物館？而這樣一個無牆的博物館為何卻與居民間有道無法跨越的高牆？地方文化館作為一個建構地方認同的工具，為何努力的只是期待居民的政治認同？

2009年，研究者因轉換為母親身份而離開工作崗位回歸家庭，從博物館的主事者轉而以居民身份參與社區事務，並與社區夥伴一同經營「山城美館」。該館為主要由社區藝術創作者所組成的社區型美術館，沒有公部門經費挹注、沒有專業博物館行政人員，完全採合議制的集體經營模式，這對剛從理性官僚體制離開的研究者而言，是毫無效率的體現。在習慣公部門經費預算相對充足的執行經驗中，社區籌設的地方文化館常常面臨捉襟見肘的窘境，美館從策劃展覽、舉辦活動，全部由參與者一同完成，過程中也開始誘發在地住民加入創作，更進一步藉由在地發明的「不一鼓」來號召社區居民的參與和凝聚共識。在不同的工作模式轉換中，研究者也開始回頭檢視過去黃金博物館的社區政策作

³ 文建會於1994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⁴ 研究者就讀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為，發現生態博物館的理想性，由私人（社區）組成的美館來實踐似乎較為接近，而公立博物館卻偏離了建構公民社會的機會。

研究者身兼城鄉規劃專業者、地方新移民以及博物館主事者的多重角色，既是圈內人也是圈外人 (insider-outsider)，在分析研究案例時混雜著多種情結，既理性又感性，一來期待分析公私立地方文化館實踐生態博物館論述的真實處境，試圖為深陷相同處境者提供一個可能的答案；二來最重要的企圖應是研究者找尋自我專業與工作歷程的認同過程。

這裡是金瓜石不是九份：黃金博物館籌建過程的歷史脈絡

黃金博物館座落於臺灣東北角之金瓜石，曾經是東亞第一大金礦山，1980年代末期隨著礦業沒落⁵、人口外移，山城急速沉寂。1990年代，因懷舊觀光與電影發展，帶動了九份聚落成為都會居民文化消費的熱門地點（林敏，1995: 1），九份興起觀光發展，再現聚落第二春，眼看著電影絕大部分取景於金瓜石而九份卻獨享其利，促使地方人士集思聚落再發展的可能，紛將其對於金瓜石地方的發展想像，投射在製作出一個博物館的空間樣貌，一來期望創造如同九份般再發展之可能性，二來拒絕因九份聲名大噪，金瓜石被納入其中而遭去名化，這股因危機意識而激起的地方認同與社區意識，讓地方自主動力漸漸浮現，轉而積極行動保存礦業遺址如太子賓館、日式宿舍與舊辦公室等，並爭取博物館之設立，為黃金博物館成立之濫觴。

2000年瑞芳風景特定區成立，籌劃中的博物館劃歸當時的縣政府建設局轄下的風管所管轄，並接手進行籌備規劃，初期規模仍是以單一館舍概念為出發點，專注於修復本山五坑旁的舊辦公室作為小型展示館之用。2003年因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⁶開館營運，籌備期間打破單一館舍思維，將博物館放置在區域整合與社區帶動的立場，提出八里左岸計畫，是縣立博物館中第一個以區域整合概念為出發點的博物館，在當時創造極佳成效。成功案例的啟動，遂使博物館的籌備工作由縣政府建設局移轉至文化局執行，同時引入生態博物館論述，轉為以園區型態規劃，並正式以黃金博物館為名，在2004年正式對外開放，整體園區規劃朝向回復過往礦業的生活面貌，以發展文化觀光為重要標的。

訪談發現，博物館籌備權責從建設局到文化局的轉化過程，似乎是促使初期參與居民退出的關鍵，博物館作為政治人物政績之展現，緊迫的時程只能選擇放棄與地方漫長的溝通與協調，再加上博物館館員皆為外來者，並以博物館專業為首的菁英觀點籌備博物館，在種種權力與知識不平等的狀況下，博物館雖成功營運開館，但缺乏社區參與的決策過程，卻也埋下與社區關係衝突之根源。而以生態博物館的角度來檢視，博物館也並未走向社區培力或凝聚共同體意識的路徑，而僅是創造地方就業機會、參與地方節慶活動與提供社區課程等，期待居民的政治認同。且對於社區事務，也因博物館輪替中的主事者個人喜好與對地方文化館政策認知的不同而有差異，缺乏以博物館作為建構公民意識的思維。

⁵ 1987年金瓜石之臺灣金屬礦業公司正式結束營業。

⁶ 現為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這裡不是金瓜石是水湳洞：山城美館的發展脈絡

山城美館成立於 2009 年，起源於 2008 年暑期的祈堂藝術市集活動，在地年輕一輩的藝術創作者有感於老街的破敗與沒落，經與耆老們溝通後與黃金博物館⁷合作，將金瓜石的祈堂老街閒置房舍整理開放，讓地方文創品進駐老屋，開始了「水金九地區」第一個文化藝術創意市集。雖然老街再造並未因此一砲而紅，但這樣的活動參與過程，卻讓在地藝術創作者因共同的參與經驗，而有彼此熟絡的機會。活動結束後，參與夥伴有感於在地創作發表平臺的缺乏，遂合力在水湳洞租下一棟三層樓的房舍作為地方社區藝術文化交流的平臺，此為「山城美館」的成立始末。

美館成員皆屬在地社區居民，包含回鄉的舊住民與新移民，無公部門經費挹注、沒有財團背後支持，空間完全由成員共同勞動完成，不假他人之手，定期舉辦特展、藝文講座、藝術體驗、人體素描與音樂活動等，儼然是一個類似社區博物館與另類地方美術館的型態。夥伴關係平起平坐，以事事協商的合議制進行，看似沒效率的討論過程全然是公民社會自主動力的雛型呈現。過程中也開始吸納新成員的加入，並刺激在地創作，讓參與者在創作的過程中重新建構自我認同與重新看待水湳洞地區，山城美館不是為水湳洞正名而發展，卻讓水湳洞因為美館而開始被看見。

2010 年山城美館的成員之一許居福發明了「不一鼓」，藉由海邊撿拾而來的浮球作為共鳴鼓身，繃上胚布取代獸皮，這樣在地發明的鼓，引發研究者想藉著共同習鼓作為建構社區共同體意識凝聚的工具，遂在 2010 年開始進行「鼓

動山城」計畫⁸。「不一鼓」的理念係針對特定社區／社群的人們，發揮特定的社會性、教育性或心理性的功能，用鼓來作為對話與溝通的橋梁，它重視參與者在聆聽彼此聲音及共同擊鼓的過程中，對自我的覺察省思以及與團體的互動產生對話。

「不一鼓」在社區招募參與夥伴的過程經驗中，可以明顯看出不同年齡層與族群的出現，似乎匯聚社區居民參與這件事，是一件可操作的工具。且鼓與臺灣人的傳統文化生活息息相關，用鼓來做切入，先從打鼓練身體或打發時間開始，進而開始用擊鼓來回復過往礦山聲音的記憶。鼓不再是敲擊的樂器，而是作為一種社區營造的可能性工具。

「不一鼓」作為山城美館與在地社區連結的重要工具，推展至今仍在持續，目前並開始聚攏社區婦女的參與，讓家務勞累的身心有紓解的管道。這樣的發展過程，也與作為推手的研究者因自身處境相同有關，雖是打鼓，但也同時激發出社區互動與發展的各種可能性。

2011 年底美館進駐水湳洞的展演藝廊，公共參與的開放度因進駐公共空間而具體呈現，除繼續推動用在地鼓說在地故事外，也開始進用在地婦女就業，一同參與其中，以水湳洞地區作為類博物館的發展基地，實踐在地生活的食藝住行育樂計畫。博物館作為公民社會的工具無法一蹴可幾，山城美館的實踐過程雖未完成，但確實已朝向理想目標前進。

新博物館學潮流下的生態博物館論述

布爾迪厄 (Bourdieu) 在談及藝術品

⁷ 研究者當時為代理館長。

⁸ 研究者為「不一鼓」經理人與該計畫推動主持人。

味與文化資產時，深刻指出藝術的感知養成分為兩種層次，一種是貴族般從小耳濡目染，深刻內化而自然生成，另一種是藉由教育的手段灌輸而試圖自然化人的觀看模式，目的與期待都是朝向一種貴族式的品味與觀點，以學校教育為工具，人在不知不覺中被操縱與改變。布爾迪厄提出關於博物館與教育系統的差異時，亦討論了博物館操作的本質，其角色無異於一般教育體系負責規範求取知識和文化的管道及資格，以期創造出一個思想整合的社群，這樣的博物館操作模式具有排他特質，執行知識的再生產或認同的建構，具有一種潛在的霸權 (hegemony) 力量。布爾迪厄這樣的批判觀點影響到 Tony Bennett 對所謂博物館作為一個國家教化人民工具的省思，也影響到法國 1970 年代的學運，並帶動法國新博物館運動的興起，重新思索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開始思考與在地社區發展連結之可能性，著重在「人」的經營面向 (Harrison, 1993: 166)。此部分與民主時代發展趨勢契合，使得博物館在營運型態與經營策略上產生改變，成為社會運動的工具之一。

生態博物館是一個充滿實驗與理想色彩的革命性運動，它在理論前提與實務運作上都與傳統博物館迥異，係以地方博物館的概念，整合該地域內所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資產，並將其完整的呈現出來，以「在地」的方式，致力於保存、維護、研究、展示和教育工作。這樣的論述是期待博物館由公部門與地方族群共同構思、形塑和營運，鼓勵居民積極參與保存、研究、詮釋、展示與教育工作，並以發展地方集體認同、建構社區美好未來為終極地 (張譽騰, 2003: 14-68)。

黃金博物館在籌備當時即列為臺北縣政府年度重要計畫項目之一，開館時程的緊迫與期程壓力下，以致於無力進行社區參與的實踐。同時，地方居民對

地方文化館營運後為地方帶來經濟效益的期待，都迫使黃金博物館的社區之路難行。在放棄了籌備階段已經醞釀的社區參與基礎，再回過頭來期待由下而上的過程，如果未認清博物館本身的角色、功能與定位，並作為博物館長期營運的核心價值與目標，生態博物館將只是博物館空喊的口號。

而由社區特定族群組成的山城美館，一開始即無須承擔社區期待的包袱，不從社會運動或社區營造的思維出發，而是藉由藝術文化平臺的建構與「不一鼓」來刺激社區的參與，食藝住行育樂計畫用生活化的方式推動水滴洞地區再發展的可能性，從建構在地居民的自我認同到特定族群共同體意識之凝聚，私人經營除須顧及經濟的壓力，且須持續朝向公共性發展，是公立黃金博物館所不及之處。黃金博物館由專業人員掌控博物館知識詮釋的權力，卻忘失了自身的使命與任務，而山城美館藉由藝術文化活動讓居民有實際參與的機會，雖不以生態博物館為名，卻更朝既定方向努力前進。

臺灣的地方文化館政策現況

臺灣在 1990 年代隨著文建會政策的支撐，開始大量興建地方文化館，其發展脈絡可回溯至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過程。地方文化館通常為政府國家機器建構地方感的主要機構，其目的無非是因應全球化產業結構變動，及期望以文化觀光帶動地方振興，動機相當浮面。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畫」的政策宣示中，雖強調地方文化館係作為凝聚居民認同與提供文化公民權之所需，但其實際執行面卻仍是做為地方文化觀光資源的主要功能，強調「一鄉一產業·一鄉一文化」，以及考量地緣政治分配資源。而認同的建立，則偏向於被動式文化參與

後的博物館政策認同。

隸屬縣市政府的公營地方文化館，不論從社區營造、文資保存、文化觀光、地方認同等，往往被賦予眾多社會想像，更須擔負地方產業振興與再發展之觸媒角色，兼具多重使命，這可從文建會政策宣示中看出端倪⁹。被賦予多重想像與期待的地方文化館，無法從傳統的博物館經驗或論述中獲取養分，而源於法國，講求由下而上、居民參與精神的生態博物館論述，適時填補了這個急迫的缺口。易言之，生態博物館論述與實踐的引進，整合了「地域文化認同、歷史空間保存、生態資源、原住民文化重建、地方產業再發展」等課題，可說是「1990年代臺灣地方文化館規劃的一個特殊現象，或者說是一個具代表性的論述」（慕思勉，1998: 46）。所以一時之間臺灣業界在面臨聚落保存、社區發展或文化觀光相關課題時，便提出生態博物館的願景。但弔詭的是，一個由上而下在政府政策下執行的公營博物館如何真正做到由下而上？而長期缺乏公民社會與公共論壇基礎的臺灣社會脈絡，當政府願意賦權時，居民的動力與資源能有多少？作為建構公民社會的工具，公屬機構是否有容許等待居民成長的彈性？

在楊弘任關於屏東黑珍珠故鄉的研究中，提出文化轉譯的概念，提供了本研究思考的角度，套用在博物館與地方關係中，兩者之不能成為夥伴在於缺乏文化轉譯的過程，彼此的語言不能說出引發對方興趣的關鍵，論述與實作之間缺乏一個有效溝通的媒介，以致無法建構深刻的相互認同（楊弘任，2007: 51-60）。最終，公立的地方文化館在社區居民眼中，還是官府。這也是公立屬

性的地方文化館政策執行，長期以來無法扣合政策初始美意的主因。楊的研究對象乃是外來移民人口相對較少的舊社區，在舊社區早已運轉無力的狀況下，找尋一個新的認同點，但回歸本研究的社區組成，新舊移民間複雜難解的問題，若要社區全面動起來，勢必更加困難。

安德森在其《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及工具的演化讓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可能性，透過小說與報紙的傳播，跨越空間將一群人集結起來形成所謂的想像共同體，這時地域性不是絕對關係，而在於是什麼牽連著共同的想像（Anderson, 1983: 231-258）。一直以來「社區」總是困擾著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博物館作為一個地方居民共同體想像的工具，乃因其述說著地方性的過往歷史與故事，而透過博物館回顧的過程中，居民產生了對地方共同體的感受，但對於一個開放性的社區，新舊移民摻雜的昔日舊礦山到今日觀光發展的社區，博物館如何在以過往記憶為號召的前提下讓新移民認同，並與舊住民產生共同體想像，較之臺灣一般人口較單一化社區，是更艱難的挑戰。

過去研究者常常質疑社區被框在地域性的架構內被討論，一群人因為住在地理區位上屬於同一個地方就被認定為社區，而如果檢視 community 一字，其實比較偏向社群意義。在日文中，「共同體」會較貼切，擺脫了地域的框架，而在臺灣所謂的社區營造或社區發展，為何如此鎖定於空間意義之上？安德森給我們的啟發是，地域本來就容易被共同體所想像，我住哪個地方，我是哪個地方人，我來自於哪個地方，在過往社會關係緊密的傳統社會，共同體意識原

⁹ 配合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執行，研提「地方文化館計畫」（民國91-96年），主要利用地方既有閒置空間，輔導成為地方文化的展示場所，一方面提供居民文化公民權之所需，凝聚居民認同，另一方面則成為地方文化觀光的資源，帶動社區發展。

本就緊密聯繫在地方上，但隨著傳統鄉鎮結構的崩解與都市生活的離散，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期望的就是再度喚回地方的認同與共同體意識，藉由社區營造的擾動社區策略，讓大家重新思考、重新歸位，而地方文化館即是那個觸媒工具，透過地方記憶的追尋，重新建構地方感，只是往往這個建構認同的過程少了居民的實際參與，由所謂的專業者來完成，失去社區培力的機會，博物館與社區居民間少了認同的連繫，區隔出「自我」與「他者」。

不僅是博物館與社區，新移民與老住民也似乎有一道藩籬，前者經過選擇移居他鄉變成新故鄉，通常建構在深厚的認同感基礎上，而後者在歷經地方經濟崩解與人口外移的過程中，對土地與家鄉的依賴變成無奈，兩者看待地域的情感與方式不同，衝突與問題就產生了。所以不只博物館有社區焦慮，新移民也面臨融入社區的難題。山城美館以藝術文化為媒介，漸進式的企圖融入新舊居民之生活中，並藉由一個社區發明的「不一鼓」來串聯新舊住民間的隔閡。

結論

文建會在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乃至後來的地方文化館政策，在某些企圖與觀念上與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相契合，這個在西方社會產生的論述，移植到臺灣社會脈絡實踐的原因，似乎是因其以全面性的思維來看待社區再造，並提出一個替社區發展困境解套的美好想像，所以當 1990 年代臺灣興起地方文化館熱潮時，所憑藉的論述基礎就是生態博物館。但這種從西方移植而來的論述，套用在臺灣的社區現實中，期望藉由地方文化館作為工具進一步讓社區居民認識自我、啟蒙自我、改造自我或產生新的地方知識生產過程的本意，

似乎容易被臺灣的社會現實扭曲作為社區發展與困境解套的美好藍圖。地方文化館如何作為一項工具或過程來承載地方的文化，除了強化地方的認同感外，深厚的文化可轉化成文化觀光的有力資本，後者是禮物，博物館依舊是教化工具，在文化公民權的思維下，如何賦權與提昇公民資能變為實踐過程重要的步驟。臺灣地方文化館政策，雖有其理想性的鋪陳，但往往將文化觀光列為首要目標而犧牲地方文化館作為其建構認同與培植公民資能的機會，只能說經濟發展是社區居民最熱切期待的，這是生態博物館在臺灣發展的現實與變相。

隸屬於新北市政府的黃金博物館，以生態博物館論述為其發展主軸，由上而下的執行過程，有別於法國或其他國家的生態博物館由下而上的歷程，具有本質上的差異。成立至今，與社區關係的矛盾與複雜仍未找到一個平衡點。檢視博物館眾多的社區政策，本研究發現黃金博物館所企求的反而是社區居民對博物館的政治認同，而非將博物館作為地方認同與提昇文化公民權與增進公民資能的工具，且隨著主事者之更替，因其認知與背景之差異而有不同，難以將生態博物館運作作為其一貫執行之核心價值。

在地方政府的文化與經濟想像中，地方文化館必須達到吸引大量觀眾，創造地方產業契機，所以就效率而言，由上而下的執行行動最具成效性，同時在缺乏社區意識的狀況下，居民也關心政府大量的資金投入能否帶來人潮與消費，帶動地方商業活動，提高地租收益。所以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下，對黃金博物館帶動文化觀光發展大過於其成為生態博物館的理想訴求。而居民某種程度依賴博物館帶動的文化觀光發展，期能雨露均霑，所以當博物館的實際政策運作給自己定位的是創造產值與經濟效益時，就會偏離理想生態博物館愈來愈遠，

而致力於文化觀光或偏向傳統博物館經營模式發展。當地方文化館由一個建構地方認同的工具轉為政績的展現時，地理區位發展不均衡與社區間的階層落差，促使更複雜的地方社會構成，偏離均質共享的遠景，自然造成更多社區衝突與對地方文化館的對抗。在一個視文化觀光為萬靈丹的臺灣社會脈絡下，生態博物館論述變成用來包裝與被消費的商品符號，並藉由其歷史意義與地方意象結合建構的地方感，成為振興區域經濟、再造地方繁榮的靈丹妙藥，基本上還是摒除了「人」的重要性。

山城美館的經驗是另一種實踐的開始，除了藝術文化，在2010年提出「不一鼓——鼓動山城」計畫，藉由在社區發明創造的手做鼓作為凝聚社區居民共同體意識與建構認同的工具，不只是藉由擊鼓回復過往礦山的聲音記憶，也期望發展出另類社區營造的工具與論述。2012年提出山城食藝住行育樂計畫，作為推動水涵洞成為類博物館的可能性，研究者身兼博物館專業者與社區行動者的雙重角色，以鼓與平實的生活實踐作為文化轉譯的工具，讓論述融入實踐，在這集體共同經驗的過程中，創造共同體意識與認同。

黃金博物館作為公部門地方文化館理性官僚思維的執行單位，如果缺乏自我角色的認知與釐清，很難達成其理想性，且社會總是將文化觀光列為首要目

標而犧牲地方文化館作為其建構認同與培植公民資能的機會，經濟發展是社區居民最熱切期待的，這是生態博物館在臺灣發展的現實與變相。反觀山城美館非官方的經營型態在沒有社區居民期待發展的壓力之下，過程中以一種開放性的模式，透過藝術文化讓參與的社區居民開始有認識自我與成就自我的機會，雖不是以過往的共同記憶為出發點，但藉著不斷累積共同經驗的過程，創造一種共同體意識，也透過激發參與者的各式藝術創作來建構自我認同，最重要的是沒有既定模式的合議制，事事協商、事事溝通，少了效率，但符合公民社會的精神，同時雖不以社區參與的量為目標取向，卻增加了參與後的深度與永續性。地方文化館計畫強調由下而上的過程，是文化公民權賦權與建構地方認同的計畫，但放置在隸屬於地方政府的黃金博物館中，其必然由上而下的政策執行過程如何做到上述目標，是一個政策邏輯上吊詭之處。反觀全然民間自主策動的山城美館，利用藝術實踐的過程來一步步朝向公民社會，沒有政策驅使，卻朝向理想典範之路邁進。

誌謝

本文感謝論文審查者所提供的寶貴建議，讓文章益臻完善。

參考文獻

- 林明美，2006。博物館有什麼價值，頁：65-74。臺北：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 林欽，1995。聚落保存計畫與草根社區運動：九份的個案，頁：1。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譽騰，2003。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頁：14-68。臺北：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 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頁：51-60。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慕思勉，1998。臺灣的異質地方：90年代地方或社區博物館的觀察，頁：46。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 231-258.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 Routledge.
- Debord, G., 1957. *Toward a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In: Bishop, C.(Ed.), 2006, *Participation*. London & Cambridge: Whitechapel and the MIT Press.
- Harrison, J. D., 1993. Ideas of museums in the 1990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3: 166.

作者簡介

施岑宜現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How Can Museums Make Communities Work? A Case Study of the Jinguashi Area

Chen-Yi Shih*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awareness has been increasing around the world of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fy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Local museum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ommunity. They interact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act as a catalyst for local cultural cohesion. Cultural tour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enhancing lo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local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for stimulating the local economy. Through “community renaiss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regional activities promote and combine “industry”, “culture”, “art”, “leisure”, and “life”. The result is the rebirth of the community. The fast growth in Taiwanese local museums in the 1990s resulted in the promotion of local manufacturing cultur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look into the booming local museum phenomenon in Taiwan. How community residents,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museums, to identify their place and reproduce community culture under the current trends in cultural tourism is analyzed. In addition,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First, what caused the fast growth of Taiwanese local museums in the 1990s? Second, what kind of policy thinking and museum discourse determines the practice of Taiwan local museums, and why have they strayed from the ideal? Third, catering to cultural tourism, what are the choices and challenges that local museums are facing?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Taipei County Gold Museum in Jinguashi, this paper aims to sketch the role and mission of local museums, as well as to reflect on the orientation of local museums and analyze their benefits.

Keywords: policy of local museum, Gold Museum, Art Museum of Mountain Village

* PhD Candidate, Graduate School of Art-Culture Policy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E-mail: whosehouse@gmail.com

